

仓修良 主编

中国史学

■ ZHONG GUO SHI XUE MING ZHU PING JIE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名著评介

第一卷

仓修良

主编

中国文学名著译丛

周易城述



鲁新登字2号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第一卷

仓修良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5印张 5插页 416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811—3,830

ISBN 7—5328—0851—3/k·23

定价 28.70 元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四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典籍。其中仅以史籍而言，已是浩如烟海，它不仅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而且记载之连续、体裁之多样，都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记录，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最好见证。因此，它不仅是我们研究祖国历史的重要宝库，而且也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研究自己的历史时，也还是要借助于它，在研究世界科学发展史诸如天文学史等时，也还是要依赖于它。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份珍贵遗产是不应当被忽视的，更不应当轻易地加以否定，而是应当批判地加以继承，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创立新的文化提供养料，特别是要总结继承和发扬历代史家所创立的许多优良传统。

然而，在前几年所兴起的“文化热”中，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中，有些同志有意无意地在否定中国传统的史学。如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学家只重视微观研究，而不重视宏观研究，这一结论出来后，好多报刊都加以

摘引，影响很大。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的。就以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而言，这是一部贯通上下三千年的通史，司马迁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论述了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重大问题，而且记载了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和边疆邻国的历史，应当说内容涉及了社会的诸方面。如果读过这部伟大著作的人，总都不会说司马迁写《史记》只注意微观研究而不重视宏观研究。它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对于楚汉之争和汉初社会的描述，究竟是微观还是宏观，读者自己可以下结论。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讲自己著书的宏伟目的，乃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单纯的微观研究能够达到此目的吗？又如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都是记载古今典章制度变化的史书，两位作者都明白表示他们不仅要记载这些典章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而且要研究所谓“张弛之故”，甚至于对有些制度发展的阶段特点都加以研究。象这样的著作难道说只是微观研究吗？再如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司马光在编写本书时所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样的目的难道靠微观研究能够做得到吗？事实上在这部通史中，详细地反映了历代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因为他要探讨历代的治与乱。因此，有人曾把《通鉴》称之为“专详治乱兴盛的政治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其它史体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谈到微观研究，人们会立刻想到乾嘉考据史学，这

是很自然的，其实当时不独史学如此，整个学术界都是这个风气，应当指出的是，这是清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所造成，这种政策迫使学术研究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史学家中从事宏观研究的也不乏其人，何况，我们不能以乾嘉时代的学风来概括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必须辨别清楚，历史研究是离不开微观研究的，宏观研究是建立在微观研究基础之上的，若没有大量的微观研究做基础，宏观研究将从何谈起？这应当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吧。也有的同志在写中西史学比较文章时，实际上他对中国封建时代究竟有多少种史书体裁、每种史体的长短得失等还没有搞清楚，就草草地撰写文章，作了所谓比较后，便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史体横加指责，这哪里能够使人信服呢？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从来也没有人说它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必须对它做具体的研究分析和总结，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而决不应当笼统地一笔否定。因为有一个历史事实，大家不应当忘记，即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在毁掉自己的传统文化之后而能立足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经历了数千年而一直独立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林，其生命力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和独特，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就以史学而言，还在十九世纪初，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的哲学》一书中，通过对各国历史著作研究比较后，用惊叹的口吻写道：“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163页）外国人都如此评价，难道

我们自己还能做这种既对不起祖宗又对不起子孙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为了帮助大家对祖国传统史学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受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委托，约请了全国有专门研究的历史学家对一些著名的史学著作撰写文章，编成《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分别对这些史学名著作出评论和介绍。在这些作者中，有年逾古稀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也有一大批后起之秀的中青年历史学家，大多数撰稿人对所评的历史著作都是研究有素。对每部史著既有全面的介绍，又有重点的论述，做到了知识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特别是对原著写作的目的和历史背景、原著基本内容、史体结构以及编纂特点、原著的学术价值及其影响等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因此，它实际上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既是一部供高等院校用的参考教材，也是一部带有工具书性质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读物。以高等院校文科各专业师生、中学历史教师、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以及史学爱好者和自学青年为读者对象。

本书编撰体例力求合一，因此，对一些技术性问题都作了统一的规定和要求。但文章成于众手，各篇写法又没有强求一律，因为每位作者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笔法，不强求一律，可使读者看到每位作者写文章的风格和笔调，尤其是对于观点性的问题，我们是采取文责自负的原则，因为这样能更好地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文章既是各自成篇，出于众手，那末，在各篇之间存在某些重复，甚至有互相抵牾之处，也就在所难免了。

所谓史学名著，一般都是选择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性，或者具有一定影响的著作。但有些也并不尽然，如二十四史之中，除前四史外，并非部部都称得上是名著，但是为了使读者了解到二十四史是由哪二十四部史书所组成，其各自的价值如何，自然都得一部不漏地全部收入；又如《唐会要》，实际上是一部史料性的著作，自然称不上名著，但为了使读者了解会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史体，故将这种体裁的第一部选入其中；再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就其思想性和史料而言，都很难说有多大价值，但由于它创立了纲目史体，并对后世起了很大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纲目体史书，故亦把它收入。还有《东观汉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史书，从唐代以后慢慢失传，虽无完本传世，但在它存在之日，却是一部享有盛誉的权威著作，因而有《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者并提的“三史”之称，况且目前又有较为全面的辑本出版，自然有必要向读者介绍。凡此种种就不一一说明。本书原计划共收一百种史学著作，但由于有些作者未能按时交稿，为了不影响全书的出版计划，只好忍痛割爱，如《大唐西域记》、《大金国志》、《明实录》等便是如此。因此，现在全书实际只收八十六种。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对于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尽可能多收入一些。至于近现代所收下限很难确定，故原则上只收到梁启超的著作为止。

本书编排顺序以成书先后为准，而不采用分类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分类法所产生的轻重不均的现象，又可以使读者从史书、史体产生的先后看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总趋势及其特点

和某些规律。实际上可以起到史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的作用。

本书的第三卷是由袁英光教授所编定，因此，全书实际上是由我们二人共同主编。袁先生是我的老学长，却执意不愿挂主编之名，故只好在这里加以说明。全书编纂过程中，叶建华同志帮助我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周谷城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署签，责任编辑温玉川同志更为本书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而对于全书广大作者的热情支持更加表示衷心的感谢。

仓修良

1988年11月15日于杭州大学

总 目

第一卷

尚 书
春秋与左传
国 语
战国策
史 记
汉 书
东观汉记
汉 纪
三 国志
后 汉 纪
后 汉 书
华 阳 国 志
宋 书
魏 书
梁 书 与 陈 书
北 齐 书
周 书
隋 书
晋 书

南史与北史
史 通
贞观政要
通 典
元和郡县图志
唐会要
旧唐书与新
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第二卷

资治通鉴
通 志
续资治通鉴长
编
三朝北盟
会 编
建炎以来系
年 要 录

通鉴纪事
本末
资治通鉴
纲 目
文献通考
辽 史
金 史
宋 史
蒙古秘史
元 史
国 権
罪 惟 录
读通鉴论
明史纪事
本末
读史方舆
纪 要
明儒学案
宋元学案
明 史

十七史商榷	夷氛闻记	中国历史教科书
廿二史考异	朔方备乘	历代舆地图
廿二史劄记	小腆纪年	清朝续文献通考
续资治通鉴	附考	蒙古儿史记
文史通义	中西纪事	新元史
第三卷		
畴人传及其 续编	湘军志	中国历史研究法
圣武记	东华录	及补编
海国图志	新学伪经考	中国近三百年学
蒙古游牧记	日本国志	术史（附《清 代学术概论》）
碑传集（附续、 补、三编）	元史译文	古史新证
	证补	中国文化史
	大同书	
	中国古代史	

目 录

尚 书	王世舜(1)
春秋与左传	赵光贤(25)
国 语	陈仰光(53)
战国策	缪文远(69)
史 记	肖 黎(85)
汉 书	杨燕起(117)
东观汉记	吴树平(143)
汉 纪	邹贤俊(167)
三国志	崔曙庭(185)
后汉纪	朱绍侯 陈长琦(207)
后汉书	陈千钧 黄宝权 杨 品(227)
华阳国志	仓修良(249)
宋 书	黄宝权(271)
南齐书	赵吉惠(289)
魏 书	陈连庆(303)
梁书与陈书	陶懋炳(335)
北齐书	周文英(353)
周 书	高振铎(367)
隋 书	曾庆鉴(383)

-
- 晋书……………张大可 彭久松(401)
南史与北史……………高国抗(423)
史通……………许凌云(449)
贞观政要……………滕建明(477)
通典……………瞿林东(493)
元和郡县图志……………李志庭(519)
唐会要……………魏得良(535)
旧唐书与新唐书……………吴 枫(551)
旧五代史……………宋衍申(571)
新五代史……………宋衍申(591)

尚 书

王世舜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已有四千多年。四千多年来由文字记载而形成的典籍浩如烟海，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尚书》是流传至今的最为古老的典籍了。

《尚书》这部最为古老的典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历经劫难，积累了大量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加上文字古奥，可供参考的资料又十分缺乏，因而自古号称难读。汉代以降，注家蜂起，以研究《尚书》名家者，代不乏人。清代学者的研究成就，更是超迈前修，千载梦寐的伪古文一案，便是开有清一代风气之先的朴学大师——阎若璩解决的。近代以及当代的学者，扩大了《尚书》学的研究领域，从不同方面对《尚书》进行深入的研究，证之以地下文物，解决了许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尚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问题至今未能解决，有待于后人继续努力。

(一)

《尚书》是何时何人编纂成书的？这是研究《尚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尚书》是由孔子删定的。这个说法，到了宋代，由于疑古风气的影响，而遭到怀疑，林之奇和朱熹等人都对删书说提出过疑问。清代史学家万斯同在《群书疑辨》中，更是斩钉截铁地说：“愚谓今之《尚书》，必非圣人删定之书。”古文《尚书》，已由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中，详加考证，无可置辩地证明为伪书。而今文《尚书》，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其中有些篇章出于战国时期。这样一来，孔子删书说，当然也就更加难以成立了，所以当代学者大都否定孔子删书说。

孔子的删书说，可不可以完全推翻呢？管见以为不能。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叙述一下《尚书》流传的历史。

今天我们见到的《尚书》是今古文合编本，共五十八篇，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篇目如下：

一《尧典》、二《舜典》、三《大禹谟》、四《皋陶谟》、五《益稷》（以上为虞书）、六《禹贡》、七《甘誓》、八《五子之歌》、九《胤征》（以上为夏书）、十《汤誓》、十一《仲虺之诰》、十二《汤诰》、十三《伊训》、十四《太甲上》、十五《太甲中》、十六《太甲下》、十七《咸有一德》、十八《盘庚上》、十九《盘庚中》、二十《盘庚下》、二十一《说命上》、二十二《说命中》、二十三《说命下》、二十四《高宗肅明》、二十五《西伯戡黎》、二十六《微子》（以上

为商书）、二十七《泰誓上》、二十八《泰誓中》、二十九《泰誓下》、三十《牧誓》、三十一《武成》、三十二《洪范》、三十三《旅獒》、三十四《金縢》、三十五《大诰》、三十六《微子之命》、三十七《康诰》、三十八《酒诰》、三十九《梓材》、四十《召诰》、四十一《洛诰》、四十二《多士》、四十三《无逸》、四十四《君奭》、四十五《蔡仲之命》、四十六《多方》、四十七《立政》、四十八《周官》、四十九《君陈》、五十《顾命》、五十三《君牙》、五十四《冏命》、五十五《吕刑》、五十六《文侯之命》、五十七《费誓》、五十八《秦誓》（以上为周书）。

其中今文《尚书》28篇，篇目如下：

虞书 2 篇：

一《尧典》（包括合编本《舜典》）、二《皋陶谟》（包括合编本《益稷》）。

夏书 2 篇：

三《禹贡》、四《甘誓》。

商书 5 篇：

五《汤誓》、六《盘庚》（合编本分上、中、下）、七《高宗肅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

周书 19 篇：

十《牧誓》、十一《洪范》、二十《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诰》、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无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包括合编本《康王之诰》）、二十五《吕刑》、二

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费誓》、二十八《秦誓》。

以上今文篇目，在合编本中，《尧典》析出《舜典》，《皋陶谟》析出《益稷》，《盘庚》析作上、中、下3篇，《顾命》析出《康王之诰》。所以，就篇目而言，合编本中的今文实际上多出5篇，应为33篇。

合编本中的伪古文共25篇，篇目如下：

一《大禹谟》（虞书）、二《五子之歌》、三《胤征》（以上为夏书）、四《仲虺之诰》、五《汤诰》、六《伊训》、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说命上》、十二《说命中》、十三《说命下》（以上为商书）、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陈》、二十三《毕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以上为周书）。

今古文之分，是从汉代开始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次年，因为卢生、侯生等方士攻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阤之咸阳”（同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次事件使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汉初的统治者比较开明，对复兴文化事业十分重视。文帝、景帝、武帝都曾花费很大的力量去搜集因“焚书”而散失的古代典